

主觀貧窮輪廓及其影響因素之探究*

呂朝賢**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陳柯玫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博士

陳琇惠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本文旨在探討主觀貧窮的輪廓、影響主觀貧窮的因素、影響最低生活門檻的決策因素及各因素的相對貢獻程度。結果顯示：1. 主觀貧窮輪廓因方法而呈現差異，但彼此間仍具一定的正向關係。2. 家庭支出、家長教育程度及家庭型態是影響主觀貧窮最大的變數，反映了家庭購買力、對必需品的識別力與投資意願、家庭資本對家庭主觀貧窮程度具有相當的解釋力。3. 對最低生活門檻的決策因素及其貢獻度，若不考慮「消費支出層級」，則以需求因素影響力及貢獻度最大，其次為價格因素、參考因素、購買力因素以及偏好因素。

關鍵字：主觀貧窮、最低可接受生活標準、剝奪、生活必需品

壹、前言

貧窮門檻設定可粗分成客觀 (objective) 和主觀 (subjective) 等兩大衡量取向，客觀貧窮門檻試圖將參照效用水準 (the reference utility level)，鎖定在維持生活的基本能力 (basic capabilities) 上，此基本能力普遍被認定與維持健康和活躍生活 (即充分參與社會) 的適足消費有關 (Ajakaiye and Adeyeye,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部分結果 (NSC 101-2410-H-029-058)，感謝科技部經費補助及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的寶貴意見和指正。文中若有錯誤或疏漏，概由作者自負。

** 通訊作者，E-mail: chleu@thu.edu.tw

收稿日期：104年9月7日；接受刊登日期：105年3月18日

2001)。簡言之，「客觀貧窮」¹ 通常假定窮人即為偏離某一規範性基準以下者，或屬於某類整體分配的底層者。在現存社會福利政策、措施及貧窮相關研究中，客觀貧窮亦是最常被採用的測量方式。然而「客觀」在認識論上是有爭論的，因為這隱約指涉僅有單一事實存在，且這些事實僅係反映某些現象是符合科學精確（scientific rigour），但弔詭的是這些現象卻僅依某些（少數）人的價值判斷擇選而出（Greeley, 1994）。由於客觀貧窮通常導源自意識型態，並在既存體制下具現，且總是隸屬於某一階級，因此所謂「客觀貧窮」從來就不是社會中性（social neutral）（Nandori, 2014）。當然客觀貧窮的缺點還不僅止於認識論層次，例如：客觀貧窮門檻通常為求標準化和普及性，而無法顧及文化、傳統、區域與種族等等社會差異，以致無法反映貧窮的多面向本質，即為其眾多缺點之一。

客觀貧窮雖有其侷限，但這並不足以作為採用主觀向度來探析貧窮的理由，實質上主觀貧窮亦具有對「貧窮」的認知因人而異、貧窮門檻是反映個人渴望而非社會基本生活（Posel and Rogan, 2014）、測量標準化低、測量成本與複雜度高、實際政策措施運用少等等限制，其視域盲點不少於客觀貧窮。那麼我們採用主觀途徑來探析育兒成本的緣由何在呢？其理據有三：1. 貧窮衡量元素² 及方式或許沒有優劣之分，不同貧窮衡量方法所呈現的貧窮輪廓雖有重疊，但仍存在極大差異（Bradshaw and Finch, 2003），這代表不同衡量元素下的貧窮樣貌，彼此並非線性關係，亦不能直接和完全互替。我們認為主觀與客觀貧窮兩者間的分野亦是如此，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補式或

1 客觀貧窮門檻可粗分為食物能量攝取（food-energy intake）和基本需要成本（cost of basic needs）等兩大類型（Ajakaiye and Adeyeye, 2001）：前者會先範定出維持個人所需的身體能量水準（如：為維持生存／健康／特定活動所需的最低營養／熱量），並核計出為達到此一能量所需的金錢（消費或所得）水準，低於該所得與消費水準者即為窮人（Ajakaiye and Adeyeye, 2001; Ravallion, 1992; 2008）。後者，則是先界定為滿足某基本需要所需的消費品組合，並核計為達此消費水準所需的金錢（消費或所得）或項目基準，低於基準者即為窮人；此一界定法最早可回溯至 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 在 1899 所定的英國約克市貧窮門檻（Ajakaiye and Adeyeye, 2001; Ravallion, 2008）。另外該類貧窮門檻所採用的計算元素除常見的「所得」或「消費」外，Peter Townsend 所提倡的剝奪指數亦可作為測量元素之一。

2 衡量元素計有：（可支配）所得、（經常性）消費支出、剝奪程度、社會排除程度等四大類。

累積式的關係。2. 主觀貧窮研究在臺灣非常稀少，³ 對其進行研究有助於擴展此間解析貧窮相關議題的視野。3. 相對於客觀指標，主觀指標在社會政策與措施的修訂及實踐上有一定的優點存在 (Veenhoven, 2002)。就主觀貧窮而言，不僅與貧窮多元化本質接近，在衡量方式上亦彈性多元，足可跳脫慣行貧窮衡量的視角侷限，有益增進對底層民眾生活的瞭解，在未來社會救助相關措施的規劃設計與實施上具一定參考價值。

基於以上敘述，並考慮到在臺灣主觀貧窮調查資料闕如條件下的研究可行性，我們設定研究屬性為模擬及試驗屬性，並以育有學童家庭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選擇育有學童家庭的理由如下：首先，Hoff 等人 (2010) 針對不同家庭型態試擬最低生活預算，結果發現育有學童家庭所需的最低生活預算較高，且貧窮對兒童的衝擊較大。其次，根據我國官方低收入戶人數的年齡別統計資料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5)，2014 年 18-64 歲成人所占比例最高，超過五成 (55.07%)，其次是未滿 18 歲的兒童及少年占將近四成 (36.98%)，65 歲以上老年人比例最低 (7.95%)。此外，從 2013 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進一步檢視其家戶型態，低收入戶家戶型態以單人家戶最多 (34.5%)，單親家庭 (27.2%) 和夫婦及未婚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 (19.8%) 次之；中低收入戶家戶型態則以夫婦及未婚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最多 (39.7%)，其次為單親家庭 (28.7%) (衛生福利部，2014)。由上述可知，育有學童家庭的致貧風險較高，故本研究選擇育有學童家庭作為探討對象。

本文以主觀貧窮為焦點，試圖探究不同主觀評價方法下的貧窮輪廓及彼此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檢視影響各種主觀貧窮的因素；其次，瞭解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的影響因素及各因素相對的影響力。在本文中，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⁴ (minimally-acceptable level of living) 係以主觀評價所建立的貧窮門

3 我們以「subjective poverty」及「主觀貧窮」為查詢詞，以「篇名／摘要／關鍵字」為搜尋範圍，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兩個系統上，僅找到 5 篇主觀貧窮相關文獻，且細看內容僅有 1 篇是真正以此為主題之研究。若查詢詞改成「貧窮」則有 1,354 篇文章。

4 Veit-Wilson (1999) 在討論社會安全適宜性時，指出社會福利給付應保障所有人在符合社會最低合宜 (minimally decency) 且有尊嚴 (dignity) 的生活水準下過活。一旦無法達到最

檻，當個人或家庭無法達到社會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時，則視為貧窮。然而，在主觀貧窮建構過程中，受訪者可能低報或誇大自己的需要，所判斷的家庭貧窮訊息也因受訪者而不同。為了改善主觀評價方法面臨的問題，本研究採虛擬情境分析法探究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的影響因素，提供受訪者各種隨機組合的案例，瞭解其對案例情況的主觀評價。研究者期待透過解析以上各研究問題，除有助瞭解最低可接受生活門檻的主觀評價元素外，亦可補充既有客觀貧窮門檻的不足，作為對未來相關研究及措施擬定之參考。再者，亦期待本研究所參採的論述框架和研究成果，可供未來相關經驗研究和調查之參酌。

貳、主觀貧窮門檻——類型及影響因素

一、主觀貧窮類型

如前所述，相較於客觀貧窮，主觀貧窮是更為直接的貧窮測量途徑，透過匯集民眾對「與貧窮有關問項」的評價和意見，來建立具公共意見或共識的貧窮門檻或事實（Kuivalainen, 2014）。這些與貧窮有關的問項，凸顯出貧窮概念本質的多元，及需由多面向來探索之（參閱 Statistics South Africa, 2012），以下就是最常見的五類主觀貧窮測量方法。

最低所得問項（Minimum Income Question, MIQ）是由 Goedhart、Halberstadt、Kapteyn 和 van Praag 等人（1977）提出，其典型的問項內容為：「就您個人（家庭）來說，大約需多少錢，才能維持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即能過著勉強糊口的生活）？」⁵ 研究者透過問卷，由受訪者依自己（家庭）現狀，核計「勉強糊口」（make both ends meet）所需的「稅後所得」，並依此設算

低可接受生活水準時，即視為貧窮。不過，合宜且有尊嚴的生活水準會因窮人所處的社會脈絡而不同，在設定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時，需考量人們真實的生活經驗才具合法性。

5 其實 Gallup Poll 在 1946-1989 年間即有與 MIQ 相似的問題項：「請問對一個 4 口之家（2 個大人，2 個小孩）而言，能在此社區過活（get along）所需的最低收入是多少？」（Citro and Michael eds., 1995: 137）而許多研究者如 Kilpatrick（1973）、Vaughan（1993）亦用此次資料估計貧窮門檻，只是這些研究並未自稱是主觀貧窮門檻而已。

貧窮門檻⁶ (Kuivalainen, 2014)。

所得評估問項 (Income Evaluation Question, IEQ) 的基礎理論為 Bernard M. S. van Praag (1968) 所提出的所得福利函數 (Welfare Function of Income, WFI)，此問項是設計來評估個人福利，最早使用在 van Praag (1971) 的研究中，而稍前所提的 MIQ 可視為 IEQ 的特例之一，因為 van Praag 的問項不只是詢問受訪者「勉強糊口」所需的最低金錢數，而是需評價多層次的滿意標的，⁷ 問項內容大致為：「假設價格不變的條件下，請問您家為維持『非常好／好／充足／壞／非常壞』等不同福利水準，所需的金錢數額各是多少？」(van Praag, 2014a; 2014b) 而 1972-1982 年間在荷蘭 Leiden University，由 van Praag 所領導的以幸福經濟為主題的研究團隊，就廣泛採用 IEQ 導出貧窮門檻，因此此類貧窮亦被稱為 Leyden Poverty (van Praag, 2014b)。相較於 MIQ，IEQ 因有不同程度的經濟福利供受訪者評價，故可提供較多「所得與『所得滿意度』間關係」及「影響所得滿意度因素」的訊息，有助於校準答案及估算貧窮門檻 (Ferrer-i-Carbonell and van Praag, 2001)。

一如附錄所示，MIQ 及 IEQ 法皆無法直接取得貧窮門檻值，而是需要經過適當的統計方法（一般使用迴歸）來設算，即是以受訪者為實現不同程度的個人福利水準所需最低所得金額為依變項，而受訪者家庭實質所得及其他與需要有關的個人或家庭特徵為自變項，透過各式迴歸方法估算而得 (Danziger et al., 1984; Flik and van Praag, 1991; Goedhart et al., 1977; Pradhan and Ravallion, 2000)。但也因不同統計方法及模型內容（即納入不同的解釋變數），所得的貧窮門檻會有所差異。另外，在資料取得過程中，對所得的低報及樣本選擇偏誤亦會影響貧窮門檻值 (Kapteyn et al., 1988)。除了經驗研究實際操作問題外，MIQ 及 IEQ 在方法上，皆隱含著如下幾個強烈的預設：1. 個人有能力評判不同收入水準對其的「價值或意義」(van Praag and Frijters, 1999)。2.

6 MIQ 的設算方式如下式 (1.1) 及式 (1.2)，式 (1.1)： $Y^*=f(Y, fc)$ ，式 (1.2)： $\bar{Y}^*=f(\bar{Y}, fc)$ 。Y* 是受訪者所答之最低需要所得、Y 是受訪者的家庭所得、fc 是家庭組成。以上數學式係綜合自 Danziger et al. (1984)、Goedhart et al. (1977)、Kapteyn et al. (1988)、van Praag et al. (1980) 等文獻，並為行文方便略加修飾。

7 不同研究所採用的量尺不一樣，五至十量尺皆有。

這些言語標籤可以轉換成一個有意義且有限界的量尺 (bounded scale) (van Praag and Frijters, 1999)。3. 皆以所得為經濟福利的唯一判準。但事實上，還有許多可以影響及代理經濟福利的因素 (Ravallion and Lokshin, 2002)。

MIQ 及 IEQ 法並非十全十美，針對其方法限制，有許多替代方法被提出，其中經濟階梯問項 (Economic Ladder Question, ELQ)、經濟福利問項 (Economic Welfare Question, EWQ)、消費適宜性問項 (Consumption Adequacy Question, CAQ) 即是另三種常見的替代方法，其中 ELQ 及 EWQ 可謂是相同但不同版本的問項，且因為詢問容易，常見於相關調查研究中。ELQ 在實際研究運用上有如下兩類些許差異的型式 (Roberts, 2009)：一是來自於 Cantril (1965) 所發展的「Cantril 的自定階梯式生活評價」(Cantril's self anchoring ladder rating of life)，透過由「最差可能生活」至「最佳可能生活」共 11 等級 (階梯) 來評價自我生活狀況。但 Ravallion 和 Lokshin (1999: 8-9; 2002) 覺得 Cantril 階梯原初評價標的是幸福感 (happiness) 及生活滿意 (satisfaction with life)，對經濟福利及貧窮來說概念太大了，因此將評價對象為「經濟福利或貧窮」的問項改稱為 EWQ，其以似右的問項：「請想像一個有 9 階的梯子，最低的第 1 階是最窮的貧戶，最高的第 9 階是最富有的家戶，請問您自評貴府屬於第幾階？」來讓受訪者自評其經濟福利或是否貧窮。

ELQ 的另一個來源，則來自於若干經驗研究，以更簡潔的問項，由受訪者自評是否為窮人 (貧戶) (Carletto and Zezza, 2006; Roberts, 2009)。例如 Mahar Mangahas 即以菲律賓社會氣象站 (Social Weather Station) 組織的民意調查資料，探析菲律賓的主觀貧窮。該調查直接詢問受訪者的問題是：「請自評您的家庭是：1. 貧戶，2. 在貧窮線上，3. 非貧戶。」(Mangahas, 1995; 2001) EWQ 與 ELQ 實質上相異不大，其特點皆是去除了指明「經濟福利」受哪些因素 (例如：所得、消費) 影響，而直接由問卷填寫人自我判斷 (Ravallion and Lokshin, 1999; 2002; Roberts, 2009)。EWQ 的問題內容與 ELQ 亦相倣，唯一比較大的差異大概是經濟福利評價的尺度不同而已。

ELQ 假定對每個受訪者而言，不同經濟等級或經濟福利間間距是相同的。其次，相對於 MIQ 及 IEQ，ELQ 更傾向於反映家庭對照參考團體後所自認的相對經濟地位，它並未直接詢問受訪者是否為窮人，其判別窮人與否的

截點亦不太明確 (Lucchetti, 2011: 48-49; Statistics South Africa, 2012)。易言之, ELQ 假設問項設計的等級尺度可以反映經濟地位 (貧窮), 且受訪者有其他人或家庭的相關狀況, 並能依此自我定位 (Posel and Rogan, 2014)。

相對於上述三種方法, CAQ 則捨棄所得來當作「經濟福利」的指標, 改以消費類別來當作指標, 該方法之所以被提出的理由有二: 一是因所得在發展國家並非良好的經濟福利指標, 且每個人對「所得」的認知並不同; 再者既往方法預設受訪者對自己與他人所得有充分瞭解, 且能回答出達成不同福利水準下的必須收入, 但事實上卻非如此 (Pradhan and Ravallion, 2000)。CAQ 內容即如:「下列哪一個答案符合貴府上個月的食物支出情形: 1. 支出低於家庭需要, 2. 支出平均而言約符合家庭需要, 3. 支出超過家庭所需。」易言之, 即詢問受訪者對不同的家庭消費類別 (食物、住宅、衣著、健康、教育……等) 的適當性 (adequacy), 若整體消費低於受訪者認定的平均適當水準者即為貧 (民) 戶 (Lokshin et al., 2006; Pradhan and Ravallion, 2000)。

雖然 CAQ 可以減少如上設算方法的若干限制, 但此方法仍有一些被質疑處, 例如: IEQ 及 MIQ 視「收入」是界定經濟福利及可反映貧窮的最重要因素, CAQ 也同樣視「消費類別」有如此的判別功能; 這兩個方法忽略了有多元因素可能會決定經濟福利高低, 再者降低個人自評的彈性 (Lucchetti, 2011: 6), 收入的確對主觀福利有強烈的影響力, 但並非唯一影響因素 (Ravallion and Lokshin, 2001)。以上主觀貧窮界定方式各有其特色和限制 (參見表 1), 使用時機端視情境而定。其實不論是客觀或主觀貧窮門檻, 皆脫離不了「研究者、專家、官員」的主觀抉擇, 特別是政府所設定的貧窮線, 更是脫離不了政治決定 (van Praag et al., 1982)。主觀法所設算的貧窮線, 具有「社會共識」色彩, 雖可降低「政治性」抉擇門檻的問題, 但哪些因素對於最低可接受貧窮線造成影響, 仍舊有些許不確定性存在。

二、影響主觀經濟福利評價的因素

影響「主觀經濟地位評價」及「滿足不同主觀經濟福利所需收入」的解釋變數可粗分為成本變數 (cost variables)、偏好變數 (preference variables) 與參考變數 (reference variables) 等三大類:

表 1：主觀貧窮類型之比較

	定 義	特 色	缺點／限制
最低所得問項 (MIQ)	1. 詢問受訪者「勉強糊口」所需的最低金額數 2. IEQ 的特例	同時考慮所得和家戶特徵有關的變項	1. 所得低報問題 2. 樣本選擇偏誤 3. 以所得作為經濟福利的唯一判準，忽略其他代理經濟福利的因素
所得評估問項 (IEQ)	除了詢問受訪者「勉強糊口」所需的最低金額數，並提供多層次之滿意標的供受訪者評價	1. 同時考慮所得和家戶特徵有關的變項 2. 提供「所得滿意度」和「影響所得滿意度因素」的訊息	4. 受訪者對「勉強糊口」的定義不一定相同 5. 很難確保受訪者對其家戶總所得有充分的瞭解
經濟階梯問項 (ELQ)	1. 請受訪者以若干等級（階梯）評價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狀況 2. 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是評價之標的	1. 去除和經濟福利影響因素有關的訊息，由個人決定自身的福利水準 2. 反映出家庭的相對經濟地位	1. 無法確保受訪者在進行經濟福利評價時的參考團體皆相同 2. 沒有明確判別貧窮與否的截點
經濟福利問項 (EWQ)	與 ELQ 相似，主要差異在於經濟福利評價之標的和尺度不同，EWQ 之評價標的為經濟福利或貧窮		
消費適宜性問項 (CAQ)	詢問受訪者對不同家庭消費類別的適當性，若整體消費低於受訪者認定的平均適當水準，則視為貧窮	以消費作為經濟福利的指標	忽略消費以外之經濟福利影響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一) 成本變數

指會影響既定生活水準所需成本高低的因素，此影響一般稱為成本效果 (cost effect) (van den Bosch, 2001: 110-142)，強調滿足需要或差異所需的可支配資源 (command over resources) 多寡，例如：戶量愈大，為維持既定生活水準所需的金額就愈高 (Hagenaars, 1986: 43-55; 87-95)。

(二) 偏好變數

即反映偏好游移 (preference drift) 效果的因素, 其意指收入的個人福利函數 (individual welfare function of income) 受近期收入影響, 收入增長會造成短期效用曲線向右偏移, 但對長期效用的影響則不大 (van Praag, 1971; van Praag and Kapteyn, 1973)。這意謂人們會習慣於既有的生活水準, 因此既有生活水準愈高者,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 其渴望的及所言出的最低所得或消費亦會愈高 (Garner and Short, 2004)。由於收入增長會伴隨著對生活水準期望/渴望的提高, 因此即便收入增長所帶來的福祉提高不多且短暫, 人們還是會努力賺錢或追求 (Ferrer-i-Carbonell, 2002)。

(三) 參考變數

指會影響個人 (家庭) 所渴望或期待的生活水準之因素, 此一因素假定個人 (家庭) 對自己收入或經濟福祉的評價, 除考慮自我現實狀況外, 亦會受到其所認知的所得分配狀況、其所處環境含帶的文化、習慣、重要參照團體等的影響, 是故又稱為參照效果 (reference effect) (Garner and Short, 2004; Hagenaars, 1986: 50-55; 87-88; Kapteyn et al., 1978; van den Bosch, 2001: 132-142; van Praag, 1971)。

對於經濟福祉評價的分析, 多數研究是以迴歸模型為統計方法, 但解釋模型中所納入的變數就不一定了, 比較簡單的如: 以 Goedhart et al. (1977)⁸ 這篇被視為 MIQ 法創始的文章為例, 依變項是「勉強糊口所需的收入」, 解釋變數則是「戶量」及「對數家庭淨收入」, 前者是成本因素, 假定維持既定生活水準所需成本, 會因戶量愈大、家庭淨收入愈高而所需的金額愈高; 後者則是偏好因素, 即家庭現時收入愈高, 維持既定生活水準所需之金額會愈大。Goedhart 等人的研究可謂是最原初的格式, 之後相關經驗研究如: Hagenaars (1986)、de vos and Garner (1991)、van den Bosch (2001)、Gar-

8 此分析模型雖然非常簡化, 但依然被相關研究所採用, 例如 Bautista (2010) 對菲律賓主觀貧窮門檻的研究, 亦採用相同的模式與分析法。

ner and Short (2004) 等等，在解釋個人福利函數的模型中所加入的變數就相當多元，其中常見的參考變數包括：族別、居住區域別、(戶長) 年齡、(戶長) 教育程度、(戶長) 職業、(家庭) 所得變化等等與參考團體有關的因素 (van den Bosch, 2001)。

雖然統計模型及解釋變項大致有穩定模式可循，但是上揭三大類影響個人(家庭) 福祉水準的因素，還是有些令人質疑之處，最嚴重的指控就是，雖各項變數皆有理論上的理據可依附，但在實際分析上卻如 van den Bosch 所言，各個因素的影響力並不大 (van den Bosch, 2001: 130-131)，且因素間的明確區分僅限於「理論上」，在經驗模式中，到底哪些變數是成本因素，哪些是參考因素，並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 (van den Bosch, 2001: 222)。除此之外，每個經驗變項的解釋，實可歸納為不同因素類型，例如：「所得」一般被視為是偏好因素，但實務上，該變項亦可視為家庭能力因素，表示家庭的消費能力；相似地，對教育或職業等參考因素之解釋亦常可呈現由不同方向來理解皆合宜的狀況 (參閱 van den Bosch, 2001: 110-131)。

事實上，除歸類上的不確定性外，在分類上亦可再細緻，以便將各個影響經濟福祉的變數，放置於適當類別中。我們認為在成本因素上尚可區分成三個小分類：1. 與「必需品價格」有關的價格因素，如都市地區必需品價格就高於鄉村地區。2. 與「必需品數量」有關的需求因素，如家庭人口多、健康不佳者，即需增加必需品品項與數量。3. 增減「必需品預算額度」的購買力因素，如家庭收入與資產多，購買力就較高。而偏好因素及參考因素皆會影響「必需品組成」，偏好因素是指個人或家庭的消費慣性，家庭消費支出變項可代表購買力，亦可歸屬於此類因素；參考因素則與社會、文化或階級的慣俗所範定的消費品項有關，這一如經濟之父 Adam Smith 在《國富論》⁹中所談及：必需品 (necessaries) 除那些為維持生活而不可缺的品項外，亦需包括那些文化習俗所需的物品 (如亞麻衣) (Smith, 2000)，此類最清晰的

9 此段文句位置是在《國富論》第5冊 (*On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第2章 (*On the Sources of the General or Public Revenue of the Society*)，第2部分 (*On Taxes*)，第4篇文章 (*Article IV: Taxes which, it is intended, should fall indifferently upon every different Species of Revenue*)。

代表變項就是「族群別」。

透過以上兩小節有關主觀貧窮論述的檢證，讓我們知道，主觀貧窮實是一概括式，可比擬為一把大傘的概念，其下含涉了多種不同的測量方式，及具有若干差異的「貧窮意涵」。但可以確定的是，主觀貧窮與客觀貧窮間並非替代關係，而是替補關係，主觀貧窮可以延展我們對於既定貧窮輪廓的想像與理解，有助於讓我們在制度與政策設計上更貼近社會貧窮人口的日常生活困境。另外，我們亦簡述了影響經濟福祉的有關因素，這些因素原被歸類為成本、偏好與參考等三大類別；但由於實際操作時，將變項歸類至此三大類別的困難與不確定性，因此本研究將三大類別再細分為價格、需求、購買力、偏好、參考等五大類別。以下我們將以此節討論結果為解析框架，分析不同主觀貧窮輪廓及影響因素、影響虛擬家庭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之因素及其相對貢獻程度等兩個研究問題。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所需資料無法從既有學術調查資料庫取得，故採自建調查資料來分析研究問題。以育有學童家庭為調查對象，透過問卷調查法，搜集國小學童家庭的家庭訊息，及受訪者對問卷中虛擬案例（vignettes/case scenarios）之評價。除此之外，此份資料亦擷取整合部分政府公務統計資料（教育部統計處，2016），以補充問卷調查資料之不足。再者，問卷受訪者是由「學童及一位家長」共同完成，如涉及到全家的生活條件與生活用品的判斷，皆由家長來填答，而涉及到兒童的問項則由學童回答、家長修訂。另外，和虛擬家庭生活條件有關的問項則由家長評價。

由於本文屬初探性研究，以嘉義縣市國小5至6年級學童家庭為研究對象，抽樣方式為分層集群抽樣（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依都市化程度區分成4個分層（嘉義市、嘉義縣〔市〕、嘉義縣〔鎮〕、嘉義縣〔鄉〕），以簡單隨機方式抽取20間國小，每個國小最多2班學生（5年級及6年級各1班），凡被選定的班級全班都填寫問卷。問卷是商請被抽取到的學校老師（以班級導師為主）進行部分問卷填寫，然後由學童帶回家，由家長完成問卷後再繳

交給學校老師。本研究原初設計 1,000 份不完全相同的問卷（基本問項皆相同，但虛擬案例皆不同），其中 200 份為備份問卷，故一共發出 800 份問卷，實收 778 份，回收率高。但由於是集群抽樣，所抽取到的小學不一定同意施測，因此，在鎮與鄉的兩個分層上，運用較多的替代學校樣本，故與原初抽樣設計有所偏離，最後所得的樣本數量如右：嘉義市 191 份（4 間國小，占樣本總數 24.55%）、嘉義縣〔市〕147 份（3 間國小，占樣本總數 18.89%）、嘉義縣〔鎮〕84 份（2 間國小，占樣本總數 10.8%）、嘉義縣〔鄉〕356 份（11 間國小，占樣本總數 45.76%）。

問卷調查的第一步驟是建構問卷，研究者先透過文獻及焦點團體，擬出「實際與虛擬家庭最低生活收支調查問卷」，該份問卷內容計有「受訪者的家庭基本資料（7 子題）、對貧窮家庭的看法（2 子題）、虛擬家庭最低可接受生活條件（2 子題）」等三大項。問卷內容依研究問題而異，第一點研究問題所包含的五類主觀貧窮指標，皆透過「家庭基本資料」和「對貧窮家庭的看法」等問項來蒐集資料。第三大項問項與第二點研究問題有關，涉及虛擬家庭的生活條件，第 1 個子題內容為靜態虛擬家庭（在問卷中以「胖虎家」稱之）生活設施設備相關問項，計 26 題；第 2 個子題則是以要素調查（factorial survey）進行分析，亦即採虛擬情境分析（vignette analysis）方法設計出的隨機虛擬家庭情況問項，每份問卷皆有 3 個動態虛擬家庭，問項如圖 1 所示。因

胖虎家的假設狀況		胖虎家花費足夠過免於貧困的生活嗎？ (請圈選以下答案數字)								
胖虎住在嘉義市，		1	2	3	4	5	6	7	8	9
居家環境有點差，										
房子是自有的，										
家裡開銷主要靠父母親收入，	少									多
家中有一輛摩托車，	得	太		略	剛	略		太		得
胖虎的哥哥讀國二，	太		少		剛		多		太	離
家人皆健康，	離			少	好	多				譜
僅午餐外食，	譜									
胖虎家每月生活開銷 20000 元。										

圖 1：動態虛擬家庭例題

此，所有問卷的基本問項皆相同，但虛擬家庭的案例並不同。另由於本研究實收 778 份問卷，每份問卷皆有 3 個動態虛擬家庭，故共計 2,334 個虛擬家戶。

所謂要素調查係結合了傳統實驗設計 (experimental design) 與調查方法 (survey methodology)，並改善兩方法的限制，透過研究者依具體條件所建構的虛擬情境案例 (vignettes)，揉合傳統調查問項，建構成問卷供受訪者填答 (Atzmüller and Steiner, 2010)，以瞭解受訪者對特定情事的判斷、決策或歸因原則 (Alwin, 1984)。在經驗研究上，通常運用在有關概念發展及評斷或決策共識議題上 (Ludwick and Zeller, 2001)，如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判斷 (Taylor, 2006; Wallander, 2012)，因此相當適用於本研究。要素調查中虛擬情境案例的呈現方式是針對某個個人、物體或情境進行簡短陳述，情節內容是由若干特徵或變項要素組合而成 (Atzmüller and Steiner, 2010)。一般而言，虛擬情境案例的建構是依研究議題而定，案例產生的基本步驟有三個 (Ludwick and Zeller, 2001)：1. 確認欲使用的變項，2. 編寫有條理的案例情節，3. 隨機產生案例。此種虛擬案例產生方式，原理近似正交設計 (orthogonal design)，或謂之為案例要素正交化 (orthogonalization of vignette factor)——使各個要素值間相互獨立，但通常為免虛擬案例狀況與現實差距過大，還是容許若干案例組成要素有關連 (Alwin, 1984)。

依上揭原則，本研究以育有學童家庭為例，先設定若干固定的虛擬家庭情節，然後再由選用的自變項填入適當的情節位置，此組合過程中各變項值 (屬性) 是採隨機分派方式賦予。¹⁰ 本研究案例採用的組成要素計有 9 個：居住地都市化、居家環境品質、住宅所有權、家計主要來源、家庭交通設備、家人健康、家庭小孩數、外食次數、消費支出層級，即研究問題二的自變項 (參見表 4-1 和表 4-2)。研究者將不同變項屬性隨機組合而成的案例提供給受訪者，以瞭解其對該案例情況的主觀評價，並進一步分析這 9 個組成要素的相對重要性。

10 本研究以 QB64 語言撰寫產生虛擬案例的程式，QB64 語言下載網址：<http://www.qb64.net>，<http://code.google.com/p/qb64/>。

肆、研究變項及分析方法

本文欲探究兩個研究問題：第一，不同主觀評價方法下的貧窮輪廓及彼此之間關係為何？以及影響不同主觀貧窮的因素又為何？第二，影響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的因素為何？各因素相對的影響力又為何？這兩個研究問題所需變項與資料分析方法不同，以下分述說明。

一、研究問題一

(一) 變項說明

主觀貧窮的衡量類型包含五類，有三類屬於「主觀自評方式」，兩類係以「必需品消費能力」作為貧窮識別的指標，前者包括「家庭收支評價」、「家庭收入階層」及「家庭剝奪程度」，而後者則以「教育消費評價」和「必需品購買評價」來測量。「家庭收支評價」為次序變項，參考 CAQ 所設計，是詢問受訪者對其家庭收入與支出相比的情況，有 5 個選項：(1) 夠用，有餘錢可投資及儲蓄；(2) 大致夠用，有餘錢可儲蓄；(3) 收支平衡；(4) 稍嫌不足；(5) 相當不夠用。「家庭收入階層」也屬次序變項，依 EWQ 來設計，請受訪者自評家庭在社會中的收入階層，共分 10 個層級，最頂層是 10，最底層是 1。至於「家庭剝奪程度」，是在 MIQ 發展初始就一直被相提並論的另一種貧窮門檻制定方式，有學者亦稱此法為主觀法或共識法，¹¹ 作者則將此方法視為外部效標。問卷中「對貧窮家庭的看法」的第 2 個子題即在測量「家庭剝奪程度」，為等比變項，計有 53 個與基本生活有關的條件／生活用品，「家庭剝奪程度」即由 53 個與基本生活有關的生活用品和條件所構成，可歸類為飲食、衣著、醫療、娛樂學習、休閒、居家環境、家境與社會關係以及住宅等八類，分析受訪者的家庭剝奪程度。本文將剝奪 (deprivation) 界定為「因為家裡經濟困難而負擔不起基本生活用品 (必需品) 者」，如 Mack 和 Lansley (1985: 39) 的定義，剝奪係指「受迫性地缺少社會所認可的必需品」(an enforced lack of

11 可參考 Veit-Wilson (1987) 的討論。

socially perceived necessities)，亦即必需品的缺乏導因於家庭資源不足以負擔所致，並非個人的偏好。

另兩類以「必需品消費能力」為貧窮識別指標，皆為次序變項，使用兩種情境詢問受訪者：「若育有國小兒童的家庭有下列哪一種狀況時，可視為貧戶（低收入戶）？」「教育消費評價」包含 5 個選項：(1)繳不起國小營養午餐費；(2)常繳不起國小營養午餐費；(3)繳得起國小營養午餐費，但無餘錢買參考書與課外讀物；(4)繳得起國小營養午餐費，有錢購買參考書與課外讀物，負擔不起課外補習／活動的費用；(5)繳得起國小營養午餐費，有錢購買參考書與課外讀物，可部分負擔課外補習／活動費用。「必需品購買評價」也有 5 個選項：(1)收入經常不足支付日常生活必需品（食品、衣著、房租、水電、生活物品等）的開銷；(2)收入僅夠支付日常生活必需品開銷，但只能選擇價格最便宜或二手的生活必需品；(3)收入雖夠支付日常生活必需品開銷，但付醫療保健費用（健保及醫療保健用品等）有困難；(4)收入雖夠支付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醫療保健開銷，但付不太起社會參與的費用（如：婚生壽慶喪祭及地區性拜拜、學童畢旅／課外活動／補習、兒童讀物與休閒器材）；(5)其他，請說明。選擇第 5 個選項表示受訪者家庭的經濟無前面四種選項的情況，而此變項為次序變項，數字愈大表示家庭經濟狀況愈佳。

關於主觀貧窮的影響因素，自變項包含住家都市化程度、家長性別、家庭型態、家庭支出、家長教育年數、家庭人口數以及 18 歲以下小孩數等，編碼與基本統計量如表 2-1 和表 2-2 所示。

(二) 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在分析主觀貧窮輪廓的「家庭剝奪程度」時，採 Cerioli 和 Zani (1990) 基於模糊集合 (fuzzy sets) 所發展出來的貧窮測量，來設算每個受訪家庭的剝奪程度。這個方法的優點在於將剝奪視為一種「程度」，跳脫傳統以「是／否被剝奪 (0 或 1)」的二分法進行測量。

在分析方法上，除了描述統計外，亦採用 Arnold Zellner (1962) 提出的彷彿無相關迴歸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來探討影響五種主觀貧窮類型的因素，因此需估計五個迴歸模型。但是，當這五個模型之間的誤差項存

表 2-1：影響主觀貧窮因素（自變項）的編碼及敘述統計

變項名稱	家數	%	變項名稱	家數	%
住家都市化程度	772		家庭型態	778	
0=小型都市	168	21.76	單親與祖父母家庭	103	13.24
1=鄉村型都市	140	18.13	核心家庭（參考組）	320	41.13
2=鎮	65	8.42	單親三代家庭	77	9.90
3=鄉村	399	51.68	三代家庭	278	35.73
家長性別	775				
0=女	472	60.9			
1=男	303	39.1			

表 2-2：影響主觀貧窮因素（自變項）的編碼及敘述統計

變項名稱	家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支出	756	2.3307	1.0975	1	6
家長教育年數	773	11.9056	3.4446	0	18
家庭規模	776	3.7577	1.4199	1	8
18 歲以下小孩數	778	2.0720	0.7525	1	5

註：「家庭支出」變項分為 6 組，分別為「不足 2 萬元」、「2 萬元～不足 4 萬元」、「4 萬元～不足 6 萬元」、「6 萬元～不足 8 萬元」、「8 萬元～不足 10 萬元」、「10 萬元（含）以上」。

在相關時，如果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進行估計，將造成參數的估計缺乏效率。而彷彿無相關迴歸是採用廣義最小平方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以此法估計模型參數更有效率。

二、研究問題二

（一）變項說明

為更進一步瞭解人們對於最低可接受生活成本的評斷要素，研究者創設了一個由 9 個變項隨機組合而成的虛擬家庭——胖虎家。透過受訪者對「胖虎家花費足夠過免於貧困的生活嗎？」問項的評價，來擇選最低可接受生活成本的評斷要素，及各影響要素的相對貢獻程度。有關虛擬家庭對於適當所

得的評價，研究者是採「擴大型」的 MIQ 設計而得。「胖虎家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恰宜性評價」為依變項，次數分配如表 3 所示。

另 9 個組成要素（自變項）包括居住地都市化、居家環境品質、住宅所有權、家計主要來源、家庭交通設備、家人健康、家庭小孩數、外食次數、每月消費支出層級等，編碼與基本統計量詳見表 4-1 和表 4-2。

如前所述，將 9 個變項分類為成本、偏好與參考三大類別有其困難性，故本研究再細分為價格、偏好、購買力、需求、參考等五大類別。首先，價格係指和「必需品價格」有關的價格因素，「居住地都市化」和「外食次數」歸為價格類別。都市地區必需品價格通常比鄉村地區高，故城鄉代表價格且反映最低生活費用額度多寡；而必需品價格會影響外食的選擇，因此「外食次數」可反映價格。其次，偏好指個人或家庭的消費慣性，會影響「必需品組成」，而「居家環境品質」和「消費支出層級」皆可反映出家庭常規消費選擇、品項及規模，故將這兩個變項歸為此類。再者，購買力涉及「必需品預算額度」，家庭收入和資產屬於此類，故將「住宅所有權」、「家計主要來源」、「家庭交通設備」歸屬購買力類別。而這三個自變項皆可展現出家庭收入的豐沛度，家庭收入能力愈差，購買力愈弱。至於需求類別，指與「必需品數量」有關的需求因素，包含「家庭小孩數」和「家人健康」兩類變項，

表 3：胖虎家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恰宜性評價次數分配（N=2,330）

變項名稱	家數
1=少得太離譜	84
2=太少	203
3=少	212
4=略少	416
5=剛剛好	634
6=略多	352
7=多	192
8=太多	154
9=多得太離譜	83

表 4-1：虛擬家庭組成要素（自變項）的編碼及敘述統計（N=2,334）

變項名稱	家數	%	變項名稱	家數	%
居住地都市化			家計主要來源		
1=竹崎鄉	424	18.17	父母親收入	468	20.05
2=大林鎮	471	20.18	父親收入	683	29.26
3=朴子市	500	21.42	母親收入	477	20.44
4=嘉義市	460	19.71	祖父母收入	224	9.60
5=台中市	479	20.52	親友協助	234	10.03
			慈善單位協助	248	10.63
居住環境品質			家庭交通設備		
1=非常差	462	19.79	0=無汽機車	469	20.09
2=有點差	471	20.18	1=有 1 輛摩托車	1,385	59.34
3=普通	465	19.92	2=有 2 輛汽車	480	20.57
4=還不錯	499	21.38			
5=非常好	437	18.72			
住宅所有權			家人健康		
0=租用	1,142	48.93	0=皆健康	1,905	81.62
1=自有	1,192	51.07	1=有重病者	429	18.38

註：未標示代碼者表依分析需要創造不同虛擬變項。

表 4-2：虛擬家庭組成要素（自變項）的編碼及敘述統計（N=2,334）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小孩數	2.0321	0.6881	1	3
外食次數	1.7875	0.7586	1	3
消費支出層級	7.4323	3.9969	1	14

註：1. 「家庭小孩數」指 18 歲以下的小孩數量，「消費支出層級」變項來自於受訪者對虛擬家庭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之評價，在問卷中，我們請受訪者根據虛擬家庭的生活情境，判斷虛擬家庭每月需要多少生活開銷的金額，才能讓該家庭過著免於貧困的生活。研究者再根據受訪者填寫的金額予以分類，共分為 14 組，1 表示 12,500 元，14 表示 47,500 元，值域為 1-14，每隔 2,500 元一層。

2. 未標示代碼者表依分析需要創造不同虛擬變項。

前者會增加消費品項及數量，後者會增加醫療及相關特殊消費品（如輔具、特殊食材或家庭設施與設備），因此視為會增加家庭需求的指標。換言之，家庭小孩數愈多和家庭有人重病者表示對必需品的需求愈高。最後，「受訪者家庭收支評價」視為可反映受訪者個人消費經驗的指標，即假定受訪者會以自家經驗來推斷「虛擬家庭要多少額度的消費支出是否足夠」，故歸為參考類別。與偏好相同，參考類別會影響「必需品組成」，個人或家庭對自身經濟福祉的評價受到實際情況和所處環境的參照團體所影響。

(二) 資料分析方法

為了設算「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適宜度」各影響變數相對貢獻度，本文採用 Shapley-Owen 值為本的 R-Square 分解法（decomposition）進行測量（Huettner and Sunder, 2012）。該法基於合作賽局理論（cooperative game theory），將所有自變項皆當成是合作賽局的參與者（players），不同參與者所組成的聯盟（coalition）或合作賽局（cooperative game），會有不同的「產值」（以 R-Square 表之），並用 Shapley-Owen 值來計算出每個參與者的貢獻。

伍、實證結果

一、不同主觀貧窮輪廓及其關係

一如稍前文獻所言，主觀貧窮為一個概括名詞，下含不同評定方法，表 5 呈現三類主觀自評方式，及兩類以「必需品消費能力」為貧窮識別指標（標準）的計算結果。就三類主觀自評法而言，除「家庭剝奪程度」因貧窮分割點（cut-point）難以設定，¹² 其餘在表 5 之數值顯示，不同方法下所呈現的貧窮率並不一樣；「家庭收支評價」顯示嚴重入不敷出者占 6.52%，以收入為本的經濟福利問項（即家庭收入階層）則顯示有 12.62% 自評為低收入戶。而受訪者對兩類質性貧困指標的共識度亦有所差異，有 72.02% 認同以繳交營養

12 由於「家庭剝奪程度」是以模糊集合方式測量而得，故家庭剝奪代表一種「程度」，不易設定貧窮的分割點。

表 5：各種主觀貧窮的編碼及測量

變 項 名 稱	家數	%
家庭收支評價		
1=夠用，有餘錢可投資及儲蓄	107	13.95
2=大致夠用，有餘錢可儲蓄	188	24.51
3=收支平衡	230	29.99
4=稍嫌不足	192	25.03
5=相當不夠用	50	6.52
合計	767	100.00
家庭收入階層		
1=低收入戶（最底層）	82	12.62
2	60	9.54
3	112	17.23
4	87	13.38
5=中產階級	195	30.00
6	73	11.23
7	26	4.00
8	7	1.08
9	4	0.62
10=富豪（最頂層）	2	0.31
合計	650	100.00
教育消費評價		
1=可部分負擔課外補習／活動的費用	46	6.16
2=負擔不起課外補習／活動的費用	49	6.56
3=無餘錢買參考書及課外讀物	114	15.26
4=常繳不起國小營養午餐費	196	26.24
5=繳不起國小營養午餐費	342	45.78
合計	747	100.00
必需品購買評價		
1=收入經常不足支付	456	61.46
2=只能選擇價格最便宜者	135	18.19
3=付醫療保健費用有困難	79	10.65
4=付不太起社會參與費用	67	9.03
5=其他	5	0.67
合計	742	100.00

註：樣本數 778，各變項的遺漏數=「樣本數」減「合計數」。

午餐能力不足為分割點（繳不起占 45.78%，常繳不起占 26.24%），有 79.65% 認同以支付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力不足為分割點（收入經常不足支付日常生活必需品占 61.46%，只能選便宜貨占 18.19%）。如再進一步檢視這五個結果性指標彼此的關係，表 6 中五個變數皆呈正向關係，但相似指標間的關係會較大，例如：三類貧窮自評指標彼此間的關係，即大於兩類共識指標；而在三類貧窮自評指標間，「收支比較」與「家庭收入階層」的關係又高於其與剝奪指標的關係。

前述分析結果顯示，不同主觀貧窮雖有顯著關連性存在，但彼此所指涉的「貧窮範圍／對象」仍舊有若干差異，不同貧窮判別指標亦有如似的關係型態。這意謂當我們欲概括地描繪社會中的貧窮輪廓時，被擇選出的貧窮判別指標、經濟福祉評價方法皆會影響貧窮輪廓的型態與組成。那麼我們需要明訂一個固定的貧窮識別標準嗎？就純學術研究而言，並無絕對必要性，因為不同的貧窮面貌代表不一樣的貧窮人口及困窘情事，亦不存在僅由「科學」(science) 即可來識別或論定貧窮與否的標準。若就實際政策及貧窮相關研究者的共識來說，所謂貧窮門檻需符合公共可接受性 (public acceptability)、統計可辯護性 (statistical defensibility) 及操作可行性 (operational feasibility) 等三個原則為宜 (Citro and Michael eds., 1995: 37-39)。也因此不同的主觀貧窮門檻，可擴大我們對貧窮輪廓的視野，與既有的「客觀貧窮」有互補性，而非作為擇選「最佳」貧窮門檻的判準。

表 6：各種主觀貧窮間的關連

	家庭收支 評價	家庭收入 階層	家庭剝奪 程度	教育消費 評價	必需品 購買評價
家庭收支評價	1				
家庭收入階層	-0.5503*	1			
家庭剝奪程度	0.3948*	-0.3781*	1		
教育消費評價	0.0764*	-0.0947*	0.0579	1	
必需品購買評價	0.0447	-0.1049*	0.0229	0.5140*	1

註：*表 $p < 0.05$ ，雙尾檢定。

與客觀貧窮一樣，主觀貧窮程度或風險的高低亦受社會人口相關變項之影響，而表 6 相關分析亦呈現五個變數間存在一定關連，可能存有同時連動的狀況，因此本研究不採用多元迴歸，而是採用彷彿無相關迴歸（Zellner, 1962），來分析受訪者社經人口變項對於主觀貧窮及貧窮識別指標的影響，表 6 即彷彿無相關迴歸分析結果。表 7 的 Breusch-Pagan 檢定呈統計顯著性，表示五個模式的誤差項有同時性相關（contemporaneous correlation），以 Zellner 彷彿無相關迴歸估計，會比使用五個個別迴歸¹³ 估計更有效率，另外表中亦顯示模型解釋力，呈現出主觀貧窮高於貧窮識別指標。

在個別自變項上，家庭支出對三個主觀貧窮依變數皆呈負向影響，家庭支出愈高，則剝奪愈低（家庭收支短絀愈少，收入階層愈高）；家庭支出是「購買力的實質展現」，因此該值愈高即表家庭因應貧窮的抗力愈高。家長教育年數代表家庭對必需品的認識及投入意願，教育程度愈高者，愈傾向滿足學童各式生活必需品需要，因此家庭剝奪愈低（必需品購買力愈高）；家長教育程度亦可反映家長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與薪資成正比，此值愈高則家庭收支短絀愈少（收入階層愈高）。相較於其他類型家庭，單親祖父母家庭由於家庭資本（family capital）較差，因此生活能力與資源較差（參閱 Gofen, 2007; Hoffman et al., 2006），以致較高的剝奪程度，家庭收支短絀亦較大，收入階層則較低。

各依變項除上述影響因素外，亦有些許個別顯著影響力的因素，這些因素的說明如下：1. 居住地點愈都市化，生活成本愈高，因此家庭收入階層屬性愈傾向於貧困。2. 單親三代家庭因家庭資本較不足，因此較其他家庭更傾向貧困階層。3. 一般來說，男性「對生活必需品的接觸機會與認識」、「對必需品於其生活之影響的敏感度」皆較女性差，因此有更寬鬆的「必需品消費門檻」，也會因消費不一定符合需要而造成較高的家庭剝奪程度。

13 但為檢視自變項間的共線性問題，我們依然做了個別的多元迴歸，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值皆小於 3，因此共線性問題不大。另外我們亦使用順序波比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估計，呈顯著的自變項與表 7 差異很小，為計算簡便，因此未採用。

表 7：影響各種主觀貧窮的原因（彷彿無相關迴歸）

	家庭收支 評價	家庭收入 階層	家庭剝奪 程度	教育消費 評價	必需品 購買評價
家庭支出	-0.1199** (0.0442)	0.4067*** (0.0633)	-0.0124 (0.0053)	0.0212 (0.0446)	-0.0145 (0.0407)
住家都市化程度	0.0490 (0.0381)	-0.1112* (0.5450)	-0.0006 (0.0045)	-0.0340 (0.0384)	-0.0041 (0.0350)
家長性別	0.0332 (0.0936)	-0.0147 (0.1341)	0.0328 (0.0111)	0.2327* (0.0944)	0.0853 (0.0861)
家長教育年數	-0.0699*** (0.0148)	0.1378*** (0.0212)	-0.0078 (0.0018)	-0.0688*** (0.0149)	-0.0414** (0.0136)
家庭規模	0.0531 (0.0792)	0.0990 (0.1135)	0.0032 (0.0094)	0.0300 (0.0799)	0.0086 (0.0728)
家庭型態					
單親祖父母家庭	0.5349** (0.1700)	-0.5450* (0.2435)	0.0480 (0.0202)	-0.1543 (0.1715)	-0.1050 (0.1563)
單親三代家庭	0.2251 (0.1715)	-0.8266*** (0.2456)	-0.0146 (0.0204)	-0.1649 (0.1729)	0.0862 (0.1577)
三代家庭	0.0770 (0.1756)	-0.4804 (0.2510)	-0.0099 (0.0209)	0.0413 (0.1771)	0.0451 (0.1615)
18 歲以下小孩數	0.0432 (0.0999)	-0.1213 (0.1430)	0.0083 (0.0119)	-0.0435 (0.1007)	-0.0614 (0.0918)
截距項	3.4821*** (0.2600)	1.8106*** (0.3724)	0.2261 (0.0309)	2.6941*** (0.2622)	2.2790*** (0.2390)
判定係數 (R-Square)	0.1304	0.2548	0.1182	0.0516	0.0264
Breusch-Pagan 檢定值 (誤差獨立性檢定)			397.4880***		

註 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註 2：家庭型態參照組為「核心家庭」。

註 3：樣本數皆為 593。

註 4：此一分析結果與個別多元迴歸結果相做。

二、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的因素及相對影響力

最後，有關人們對於最低可接受生活成本的評斷要素及各影響要素的相對重要度，分析結果整理成表 8。表 8 顯示都市化程度愈高、家中小孩數愈多、受訪者家庭收支愈不夠用者，則生活消費不足（過低支出）程度愈高；而「家有病人」亦較「家人皆健康」的家庭，更會被評價為過低支出。若家

表 8：胖虎家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恰宜性評價（Shapley-Owen 分解）

類型	自變項	係數 (標準誤)	個別解釋比例 (R-Square%)	占整體解釋比例 (R-Square%)
價格	居住地都市化	-0.0769** (0.0256)	2.1169	2.1878
	外食次數	-0.0247 (0.0459)	0.0709	
偏好	居家環境品質	0.0353 (0.0264)	0.6081	83.9703
	消費支出層級	0.1866*** (0.0091)	83.3623	
購買力	住宅（租用）			1.9037
	自有	0.1296 (0.0713)	0.5711	
	家計主要來源（其他）			
	慈善單位協助	0.2799* (0.1097)	1.3284	
	家庭交通設備	-0.0054 (0.0555)	0.0043	
需求	家庭小孩數	-0.2152*** (0.0514)	3.2400	9.8469
	家人健康（佳） 不佳	-0.5167*** (0.0981)	6.6069	
參考	受訪者家庭收支評價	-0.1050** (0.0312)	2.0912	2.0912
	截距項	4.4166*** (0.2233)		

判定係數 (R-Square)=0.1898

F(10, 2286)=53.55***

註 1：*p<0.05，**p<0.01，***p<0.001。

註 2：樣本數皆為 2,297。

註 3：自變項括弧內為參照組。

註 4：標準誤為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

計主要來源為慈善單位捐助者，較會被評價為超額支出，且每月生活支出愈高者，超額支出程度會愈高。「過低支出」即表胖虎家整體消費支出不足，需提高總消費支出額度，才得以過著免於貧困的生活。反之，「超額支出」則是表示胖虎家整體消費支出過多，降低消費支出額度，即可獲得免於貧困的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再者，表 8 亦顯示「消費支出層級」是評核「胖虎家最低可接受生活成本」的最主要影響因素（83.36%），此一變項如稍前所述可視為是偏好或購買力因素。若不考慮「消費支出層級」的貢獻，則需求因素對「胖虎家最低可接受生活成本」的貢獻度最大（9.85%），後續因素貢獻度大小依序分別是：價格因素（2.19%）、參考因素（2.09%）、購買力因素（1.90%）、偏好因素（0.61%）。

以上分析內容大致回答了本研究一開始的研究提問，但仍舊有個在文獻已有、始終難以解決的議題存在，那就是有關於自變項的因素歸屬議題。此議題最明顯發生在「教育」、「家庭支出（每月生活開銷）」兩個變數上，既可歸屬為偏好因素，亦可隸屬於購買力因素。本研究認為稍前所區分的五大因素彼此之間並非全然無關，我們應將「偏好和參考」等兩因素視為是構建「滿足經濟福祉各項消費意圖」，此一具有驅動人類行為發生的動機變項，易言之，「偏好和參考」是此一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s）的組成要素。而能實際觀察得到，且具有影響「家庭主觀貧窮程度、恰宜貧窮門檻水準」的因素就是「價格、需求、購買力」等三類因素。「偏好和參考」因素可能是透過「消費意圖」，或者透過「價格、需求、購買力」等因素，來影響個人或家庭的主觀貧窮、最低可接受貧窮門檻，但究竟為何，則有待後續研究來檢證。

陸、結論

本研究以育有國小兒童的家庭為研究對象，透過各種統計方法，分析不同主觀貧窮的輪廓及彼此關係、影響主觀貧窮的因素、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的決策因素等研究問題。經實證分析結果，有三點研究發現：第一，儘管主觀貧窮輪廓會因方法不同而呈現若干差異，但彼此間仍具一定的正向關係。第二，家庭支出、家長教育程度及家庭類型是影響主觀貧窮最鉅的三個變

數；這三個變數的理據亦反映出重要的訊息，即家庭購買力、對必需品的識別力與投資意願、家庭資本對家庭主觀貧窮程度具有相當的解釋力。第三，在虛擬家庭最低生活門檻的決策因素及其貢獻度部分，若不考慮「消費支出層級」，則以需求因素影響力及貢獻度最大，然後依序是價格因素、參考因素、購買力因素以及偏好因素。

本研究初步分析結果對相關政策有幾個重要的意涵，首先涉及客觀和主觀貧窮的測量議題，前者為我國貧窮研究慣用的測量取徑，主要以所得或消費作為衡量元素（可參閱Chen and Wang, 2015; 王德睦等, 2005; 何華欽等, 2003; 呂朝賢, 2010; 洪明皇, 2011）。我國《社會救助法》對低收入戶的認定即屬此類，以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 60% 來設算貧窮線。然而，基於客觀貧窮所制訂的貧窮門檻多半由專家所決定（Ruggles, 1990），假設窮人為偏離某一規範性基準以下者，是依少數人的價值判斷所選擇出來的（Greeley, 1994），顯然過於武斷。雖然主觀貧窮門檻同樣脫離不了研究者、專家或官員的主觀抉擇（van Praag et al., 1982），但相較之下，主觀貧窮門檻因為基於公共意見或共識所建立（Kuivalainen, 2014; Veit-Wilson, 1987; Walker, 1987），由人們定義何謂最低的生活水準，故較能反映民眾普遍實際的生活經驗。

呂朝賢等（2015）的研究亦發現，人們對貧窮、生活必需品以及最低可接受生活標準的看法，與現行《社會救助法》對貧窮形式的界定有落差；加上官方貧窮測量未關照到人們主觀的經濟福祉，導致社會給付缺乏適宜性。因此，為了建構貼近民眾實際生活情況的貧窮門檻，研究者認為多元貧窮衡量不失為可行的方法。如前所述，主觀與客觀貧窮兩者之間本就存在著互補和累積關係，主觀貧窮在測量上更具彈性，能捕捉貧窮的多面向特質。如能兼採主觀貧窮的測量，所研擬的救助政策和給付措施不僅更能反映底層民眾的需要，亦能擴展貧窮研究議題的視野。

其次，對於最低可接受生活門檻的主觀評價元素之探討，研究結果可供相關社會政策制訂參酌。本文釐出的五大因素有效辨識育有學童家庭落入貧困的高風險因子，在實務上，亦能作為建構高風險貧困家庭快篩量表的參考指標，有助於政府單位和福利機構及早介入、及早預防，針對此類家庭擬定合宜的服務計畫，提供相關資源和支持性服務，降低育有學童家庭落入貧窮

的風險。

另外，本研究所使用的因素調查法能協助研究者瞭解受訪者對特定情事的判斷或決策，作為未來經驗研究和調查的參照。特別是虛擬案例的設計，可避免受訪者在判斷「最低可接受生活水準恰宜性評價」時受到個人特質所影響。例如在表 8 有關「最低貧窮門檻」的決策因素中，受訪者特質變數（受訪者家庭收支評價）對整體模型 R-Square 的貢獻份額不大，可見受訪者係以「虛擬條件」來判斷胖虎家生活花費的適宜性。這反映出本研究的準實驗設計問卷具有相當的信效度，對於「最適貧窮門檻的決策因素」有足夠的辨識力，且證明虛擬家戶是可減低以往主觀貧窮門檻設算時被質疑的兩個問題：判斷家庭貧窮的訊息因受訪者而異、受訪者誇大自己的需要及低報自己的生活能力。

前揭研究結果雖已大致解答前言中所提之研究問題，但仍有若干研究限制存在。首先，模型解釋力不足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特別是表 7 自變項組合對貧窮識別指標的解釋力不足；這一方面也許是樣本不足所致，另一方面則是提醒我們未來需要透過更貼切的理論或觀點，來解釋貧窮識別指標。再者，因本文資料限制，使得我們無法解釋不同因素間的潛在關連，例如：「對生活必需品的偏好及擇選的參考框架」如何影響主觀貧窮程度及最適貧窮門檻的決策？這兩類型因素與「購買力及需求」因素之間的關係又為何？這些因素之間的潛在關係尚待適當的資料分析及後續實證研究來說明。此外，本文研究對象、範圍、虛擬案例構成面向的限制，亦使得我們可以檢證及推論的範圍有所侷限。對此，未來的研究希望可藉由降低如上缺陷，而更清晰地瞭解及辨識育有學童家庭落入貧窮的高風險因子，如此才能有效透過相關措施來降低育有學童家庭的貧困情況。

附錄：IEQ 的貧窮線估算

相較於 MIQ，IEQ 的估算方式較複雜些，我們以 Flik and van Praag (1991) 的文章為主要範本，並參考 Taddesse and Shimeles (2005) 及相關文獻，整理說明 IEQ 貧窮門檻的設算方式。

IEQ 貧窮線的估計方式如式(2.1)至式(2.8)所示。個人的所得福利函數 (WFI) 如式(2.1)所示，其中， $U_i(y)$ 表第 i 個人的福利函數 ($i=1, \dots, N$)、 Λ 與 N 分別表具有平均數對數 μ_i 及變異數 σ_i^2 的常態 (log-normal) 及常態 (normal) 分配函數。

$$U_i(y) = \Lambda(y; \mu_i; \sigma_i^2) = N(\ln(y); \mu_i, \sigma_i^2) \quad (2.1)$$

而平均數 μ_i 及 σ_i^2 變異數皆是相對應於第 i 個人，並可用式(2.2)及式(2.3)估計而得，其中 c_{ij} 表第 i 個人對第 j 個 ($j=1, \dots, J$) 福利狀態的評價，例如，問項福利狀態有 5 類：「非常好／好／充足／壞／非常壞」，則 $J=5$ 。

$$\hat{\mu}_{i1} = 1/J \sum_{j=1}^J \ln(c_{ij}) \quad (2.2)$$

$$\hat{\sigma}_{i1}^2 = 1/(J-1) \sum_{j=1}^J [\ln(c_{ij}) - \mu_{i1}]^2 \quad (2.3)$$

μ 可視為需要參數 (need parameter)，其意指家庭需要愈多，則為達相同福利水準所需的收入就愈多 (Flik and van Praag, 1991; Kapteyn et al., 1988; van Praag et al., 1982)； σ 則是斜率參數 (slope parameter)，其值愈大，則評量效用函數 (值介於 0-1) 時，所需的收入範圍就愈大 (van Praag et al., 1982)。式(2.4)中 y_c 表家庭稅後所得， f_s 表家庭規模。

$$\mu_1 = \beta_0 + \beta_1 \ln(y_c) + \beta_2 \ln(f_s) \quad (2.4)$$

$\Phi(\cdot)$ 表標準常態累積分配金函數， α 為特定的效用或福利水準 (welfare level)，其值界於 0-1 間。一般 Leyden Poverty Line 依 α 值而異，亦可被稱

為 $LPL(\alpha)$ 或 α 窮人。將式(2.6)代入式(2.4)即可得式(2.7)，假設 α 為貧窮的效用門檻值 (the utility threshold value of poverty)，則家庭對數所得低於 $\ln(y_\alpha^*)$ 者就可稱為 α (水準以下) 貧戶。

$$\Phi(\ln(y) - \mu_{1i} / \sigma_{1i}) = \alpha \quad (2.5)$$

$$\ln(y_{ai}) = \mu_{1i} + \sigma_{1i} \Phi^{-1}(\alpha) \quad (2.6)$$

$$\ln(y_\alpha) = \beta_0 + \beta_1 \ln(y_c) + \beta_2 \ln(f_s) + \sigma_1 \Phi^{-1}(\alpha) \quad (2.7)$$

$$\ln(y_\alpha^*) = \beta_0 + \beta_2 \ln(f_s) + \bar{\sigma}_1 \Phi^{-1}(\alpha) / 1 - \beta \quad (2.8)$$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王德睦、何華欽、呂朝賢

- 2005 〈貧窮的測量：發生率、強度與不均度〉，《人口學刊》30: 1-28。(Wang, Te-mu, Hua-chin Ho, and Chao-hsien Leu, 2005, "Measuring Poverty in Taiwan: Incidences, Intensity and Differential Distributions,"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30: 1-28.)

呂朝賢

- 2010 〈臺灣兒童貧窮：輪廓與成因〉，《臺灣社會福利學刊》9(1): 97-137。(Leu, Chao-hsien, 2010, "Profiles and Explanations of Child Poverty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9(1): 97-137.)

呂朝賢、陳柯玫、陳琇惠

- 2015 〈育兒家庭最低可接受生活標準之初探〉，《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1: 105-164。(Leu, Chao-hsien, Ke-mei Chen, and Hsiu-hui Chen, 2015, "A Minimally Acceptabl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 Preliminary Study," *NTU Social Work Review* 31: 105-164.)

何華欽、王德睦、呂朝賢

- 2003 〈貧窮測量對貧窮人口組成之影響：預算標準之訂定與模擬〉，《人口學刊》27: 67-104。(Ho, Hua-chin, Te-mu Wang, and Chao-hsien Leu, 2003, "The Effects of Poverty Measurements on the Composition of Poverty Population: The Estimation and the Modeling of Budget Standards,"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7: 67-104.)

洪明皇

- 2011 〈社會福利政策該關注所得貧窮或消費貧窮？〉，《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0(1): 97-165。(Hong, Ming-hwang, 2011, "Should Social Welfare Policy Focus on Income Poverty or Consumption Poverty?"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0(1): 97-165.)

教育部統計處

- 2016 〈102 學年度國民小學校別資料〉。2016 年 6 月 29 日，取自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63F5AB3D02A8BBAC&sms=1FF9979D10DBF9F3&s=4EF35C6866B6F00B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6, "List of Primary Schools, 2013-2014," Retrieved June 29, 2016, from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63F5AB3D02A8BBAC&sms=1FF9979D10DBF9F3&s=4EF35C6866B6F00B)

衛生福利部

- 2014 《中華民國 102 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臺北：衛生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4, *Report on the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Family Living Condition Survey, 2013*. Taipei: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 2015 〈社會福利統計年報表：低收入戶人數按款別及年齡別分〉。2015 年 12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77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on Social Welfare: Persons of Low-Income Families by Class and Age,”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5, from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77)

B. 外文部分

Ajakaiye, D. and V. Adeyeye

2001 “Concepts, Measurement and Causes of Poverty,” *Central Bank of Nigeria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view* 39(4): 8-44.

Alwin, Duane F.

1984 “Book Reviews: *Measuring Social Judgements: The Factorial Survey Approach*,” *Social Forces* 63(2): 598-599.

Atzmüller, C. and P. M. Steiner

2010 “Experimental Vignette Studies in Survey Research,” *Method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6(3): 128-138.

Bautista, C. C.

2010 “Subjective Poverty Threshold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Philippine Review of Economics* 47(1): 147-155.

Bradshaw, J. and N. Finch

2003 “Overlaps in Dimensions of Povert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2(4): 513-525.

Cantril, H.

1965 *The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arletto, G. and A. Zezza

2006 “Being Poor, Feeling Poorer: Combining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easures of Welfare in Albani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2(5): 739-760.

Cerlioli, A. and S. Zani

1990 “A Fuzzy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pp. 272-284 in Camilo Dagum and Michele Zenga (eds.),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Berli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Chen, Ke-mei and Te-mu Wang

2015 “Determinants of Poverty Status in Taiwan: A Multilevel Approa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3(2): 371-389.

Citro, C. F. and R. T. Michael (eds.)

1995 *Measuring Poverty: A New Approach*.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Danziger, S., J. van der Gaag, M. K. Taussig, and E. Smolensky

1984 “The Direct Measurement of Welfare Levels: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Make Ends Mee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6(3): 500-505.

de vos, K. and T. I. Garner

1991 “An Evaluation of Subjective Poverty Definitions: Comparing Results from the U.S. and the Netherland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7(3): 267-285.

Ferrer-i-Carbonell, A.

2002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02-019/3.

- Ferrer-i-Carbonell, A. and B. M. S. van Praag
2001 "Poverty in Russi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2): 147-172.
- Flik, R. J. and B. M. S. van Praag
1991 "Subjective Poverty Line Definitions," *De Economist* 139(3): 311-330.
- Garner, T. I. and K. S. Short
2004 "Economic Well-Being Based on Income, Consumer Expenditures and Personal Assessments of Minimum Needs," pp. 319-361 in John A. Bishop and Yoram Amiel (eds.), *Studies on Economic Well-Being: Essays in the Honor of John P. Formby*.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 Goedhart, T., V. Halberstadt, A. Kapteyn, and B. M. S. van Praag
1977 "The Poverty Lin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2(4): 503-520.
- Gofen, A.
2007 "Family Capital: How First-Generation Higher-Education Students Break the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Discussion Paper, No. 1322-07.
- Greeley, M.
1994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nd Poverty of Measurement," *IDS Bulletin* 25(2): 50-58.
- Hagenaars, A. J. M.
1986 *The Perception of Poverty*. Amsterdam; New York: North-Holland.
- Hoff, S., A. Soede, C. Vrooman, C. van Gaalen, A. Luten, and S. Lamers
2010 *The Minimum Agreed upon: Consensual Budget Standards for the Netherlands*.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 Hoffman, J., M. Hoelscher, and R. Sorenson
2006 "Achieving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Family Capital Theory,"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9(2): 135-145.
- Huettner, F. and M. Sunder
2012 "Axiomatic Arguments for Decomposing Goodness of Fit According to Shapley and Owen Values," *Electronic Journal of Statistics* 6: 1239-1250.
- Kapteyn, A., B. M. S. van Praag, and F. G. van Herwaarden
1978 "Individual Welfare Functions and Social Reference Spaces," *Economics Letters* 1(2): 173-177.
- Kapteyn, A., P. Kooreman, and R. Willemse
1988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bjective Poverty Definition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3(2): 222-242.
- Kilpatrick, R. W.
1973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the Poverty Lin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5(3): 327-332.
- Kuivalainen, S.
2014 "Subjective Poverty," pp. 6432-6434 in A. C. Michalos (ed.),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

- Lokshin, M., N. Umapathi, and S. Paternostro
2006 "Robustness of Subjective Welfare Analysis in a Poor Developing Country: Madagascar 2001,"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2(4): 559-591.
- Lucchetti, L. R.
2011 "Three Essays on Household Welfa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Ludwick, R. and R. A. Zeller
2001 "The Factorial Survey: An Experimental Method to Replicate Real World Problems," *Nursing Research* 50(2): 129-133.
- Mack, J. and S. Lansley
1985 *Poor Britai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Mangahas, M.
1995 "Self-Rated Poverty in the Philippines, 1981-199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7(1): 40-55.
2001 "Subjective Poverty and Affluence in the Philippines," *The Philippine Review of Economics* 38(2): 122-134.
- Nandori, E. S.
2014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overty," pp. 4424-4428 in A. C. Michalos (ed.),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
- Posel, D. and M. Rogan
2014 "Measured as Poor versus Feeling Poor: Comparing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overty Rates in South Africa,"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15, from <https://www.wider.unu.edu/sites/default/files/wp2014-133.pdf>
- Pradhan, M. and M. Ravallion
2000 "Measuring Poverty Using Qualitative Perceptions of Consumption Adequac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2(3): 462-471.
- Ravallion, M.
1992 "Poverty Comparisons: A Guide to Concepts and Methods," LSMS Working Paper, No. 88.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8 "Poverty Lines," in S. N. Durlauf and L. E. Blume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 Retrieved March 15, 2015, from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download/pde2008_P000349.pdf
- Ravallion, M. and M. Lokshin
1999 "Subjective Economic Welfare," Retrieved February 22, 2015, from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i/pdf/10.1596/1813-9450-2106>
2001 "Identifying Welfare Effects from Subjective Questions," *Economica* 68(271): 335-357.
2002 "Self-rated Economic Welfare in Russi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6(8): 1453-1473.
- Roberts, B.
2009 "Subjective Welfare: Analysis of the NIDS Wave 1 Dataset," Discussion Paper, No. 14.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15, from <http://www.nids.uct.ac.za/publications/dis->

- cussion-papers/wave-1-papers/105-nids-discussion-paper-no14/file
- Ruggles, P.
1990 *Drawing the Line: Alternative Poverty Measur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 Smith, A.
2000[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Retrieved May 15, 2015, from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mith-adam/works/wealth-of-nations/index.htm>
- Statistics South Africa
2012 *Subjective Poverty in South Africa: Findings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Survey 2008/2009*. Pretoria: Statistics South Africa.
- Tadesse, M. and A. Shimeles
2005 "Perceptions of Welfare and Poverty: Analysis of the Qualitative Responses of Urban Households," pp. 72-88 in Arne Bigsten, Bereket Kebede, and Abebe Shimeles (eds.), *Pover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Labour Markets in Ethiopia*. Uppsala: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 Taylor, B. J.
2006 "Factorial Surveys: Using Vignettes to Study Professional Judge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6(7): 1187-1207.
- van den Bosch, K.
2001 *Identifying the Poor: Using Subjective and Consensual Measures*. Aldershot,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van Praag, B. M. S.
1968 *Individual Welfare Functions and Consumer Behavior: A Theory of Rational Irrationalit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1 "The Welfare Function of Income in Belgium: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3): 337-369.
2014a "Income Evaluation Question," pp. 3124-3126 in A. C. Michalos (ed.),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
2014b "Subjective Poverty: The Leyden Approach," pp. 6434-6436 in A. C. Michalos (ed.),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
- van Praag, B. M. S. and A. Kapteyn
1973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Individual Welfare Function of Incom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1): 33-62.
- van Praag, B. M. S. and P. Frijters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Welfare and Well-Being: The Leyden Approach,"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15, from <http://external-apps.qut.edu.au/business/documents/discussionPapers/1999/kahneman.pdf>
- van Praag, B. M. S., J. S. Spit, and H. van de Stadt
1982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ood Ratio Poverty Line and the Leyden Poverty Lin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4(4): 691-694.

- van Praag, B. M. S., T. Goedhart, and A. Kapteyn
1980 "The Poverty Line—A Pilot Survey in Europ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2(3): 461-465.
- Vaughan, D. R.
1993 "Exploring the Use of the Public's Views to Set Income Poverty Thresholds and Adjust Them Over Time,"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56(2): 22-46.
- Veenhoven, R.
2002 "Why Social Policy Needs Subjective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8(1-3): 33-45.
- Veit-Wilson, J. H.
1987 "Consensual Approaches to Poverty Lines and Social Securit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2): 183-211.
1999 "Poverty and the Adequacy of Social Security," pp. 78-109 in J. Ditch (ed.),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Benefits and Pover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Wallander, L.
2012 "Measuring Social Workers' Judgements: Why and How to Use the Factorial Survey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Professional Judgement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2(4): 364-384.
- Walker, R.
1987 "Consensual Approaches to the Definition of Poverty: Towards an Alternative Methodolog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2): 213-226.
- Zellner, A.
1962 "An Efficient Method of Estimating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 and Tests for Aggregation Bia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57(298): 348-368.

Subjective Poverty: Profiles and Determinants

Chao-hsien Le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unghai University

Ke-mei Chen

Doct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Hsiu-hui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paper are the following: (1) examining the profiles of subjective poverty methods; (2) explor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households' subjective poverty; (3) 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determining households'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ir minimal standard of living and their rela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minimal standard of living.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profiles of subjective poverty vary with methods applied for assessing subjective poverty, they correlate positively with each other. Furthermore, family expenditure,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and family type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ubjective poverty. This implies that purchasing power, identification of daily necessities and willingness to invest, and family capita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subjective poverty. Finally, if we do not consider the level of expenditure, need is the largest contribution to the minimal standard of living, followed by price, reference, purchasing power, and preference.

Key Words: subjective poverty, a minimally acceptable standard of living, deprivation, essentials of life